

# 监管部门“没办法”加剧食品药品信任危机

胡艺 职员

近期浙江海宁和平湖等地查出,40吨病死甲鱼骨通过一条“产业链”流入中药材市场。据了解,收购、倒卖病死甲鱼骨已成行业“潜规则”。药材企业和厂家知道这些药材从病死甲鱼得来,“病死甲鱼骨量大、好收集,成本低”,双方都“受益”。面对大量病死甲鱼骨“入药”,多个监管部门却直言“没办法”。(12月17日《新京报》)

“化学火锅”、毒胶囊事件犹在耳,“病死甲鱼骨入药”又浮出水面。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接二连三发生,让人目不暇接。如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现状令人忧虑。而且,

这些食品药品问题并非由监管部门发现,而是缘于群众举报、媒体曝光、公安机关侦查,如果不是有人举报,消费者仍然蒙在鼓里。更可怕的是,面对质疑,渔业、工商、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都直言“没办法”。监管部门都没办法,老百姓又有什么办法?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药品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国家药典规定,鳖甲等甲鱼骨作为中药材必须现杀取用。《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规定,“禁止将中毒、感染疾病的药用动物加工成中药材。病死甲鱼骨不仅药效打折,而且还可能因染有致病菌危害中药安全。然而就是这样药效打折且不安全的问题病死甲鱼骨却

堂而皇之入药了,这样的坏消息让人不寒而栗。即便报道说,公安机关查获了近40吨病死甲鱼骨,但是有多少问题药品已经进入了患者的肠胃?酸奶可以不喝,果冻可以不吃,药不能不吃,问题是,我们以后生病了还敢服药吗?

药用胶囊是工业明胶做的,中药材的原材料是病死甲鱼骨,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到毒大米,从地沟油、农药火腿到吊白块米粉,从毒红豇豆到化学火锅、瘦肉精。食品药品黑幕不断被曝光。我们的肠胃俨然成了化工厂,监管部门在哪里?工商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整个食品药品行业安全、公信在哪里?监管部门对病死甲鱼骨入药“没

办法”,岂不是自废武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本法制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对其生产的药品进行质量检验;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不得出厂。如果相关部门尽到监管责任,病死甲鱼骨制作的中药材也不会堂而皇之进入医院、药店与患者的肠胃。

食品药品安全隐患与教训太多太多。要重新树立食品药品安全信誉,企业无疑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深刻反省、检视,拿出尊重消费者的诚意,提高服务质量,不干脆

德事。但是,在商言商,商家的良心道德基本靠不住。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法律体系与监管制度,制定、完善相关食品药品安全国家标准,十分必要。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不能自废武功、回避监管责任。唯有从源头上上下工夫,从制度上强化、落实,加大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把食品药品安全检测常态化、制度化,并在电视、报纸、网站等传媒上及时公布食品药品质量检测指标。充分尊重公众的消费知情权与健康权。让制度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才能解决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化解食品药品安全信任危机,为民众营造放心的食品药品消费环境。

## 新型户籍制度是新型城镇化的有益补充

黄春景 职员

“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日前,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就“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12月17日新华网)

“2020年形成新型户籍制度”,这不仅给出了“时间表”还明确了“路线图”,使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变得清晰而可期,这是一种进步之举。最近以来,从高层表态,到国家层面政策制定,再到各地陆续出台破冰新政,不难看出户籍改革正蓄势待发,将进入全面改革阶段。而尊重意愿、分类实施、有序推进的新型户籍制度改革“三部曲”,更是为“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谱写了与时俱进的时代音符。

长期以来,户口制度一直遭人诟病,“户籍差别”所造成的“身份差别”让农民工感到城乡间的“高墙”,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弊端明显。推行新型户籍制度,关键在

于剥离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让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心声。户籍改革,不光是将户口本上的“农业”两字变为“居民”,更重要的是解决好后续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

笔者认为,提出2020年形成新型户籍制度,这是一种递进式的理性改革,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有7.1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2.57%,但是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只占约35%左右,其中17个百分点的差距即已经进入城市而未取得城市户籍的人口数量,达到2.3亿,如此多数量的进城农村户口人群,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其户籍问题,需要时间去分类实施、有序推进。

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不少地方的户籍改革亮点频现:广州、兰州的居民户口簿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此外,重庆、昆明、四川等地陆续出台户籍改革措施,放宽落户限制。特别是今年5月6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会议确定了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在不少人看来,这次会议是新一轮户籍改革提速的信号。

值得指出的是,刚刚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这意味着新型户籍制度要朝着“人的城镇化”方向改革。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2年,全国共办理户籍“农转非”2500万人,为前3年的2.2倍,2012年全国非农业户籍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5.29%。从这些数据来看,说明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2010年,这样的一种新型户籍制度,必定为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作出有益的填充,让农民成为市民或享受市民待遇不再是一个梦,从根本上消除城乡权益落差、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愿望落地生根。

## 汽车“限购令”不应盲目扩围

张枫逸 职员

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以及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也就是“限购+限行”。至此,中国四大直辖市中,已经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对汽车增量实施了限制措施。(12月16日《京华时报》)

在交通拥堵、雾霾加重的双重压力之下,汽车“限购令”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青睐。今年8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曾预测,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等八座城市将施行限购政策。如今,随着天津“限购令”的率先落地,势必会有更多的城市跟进,将这一愿景变成现实。

车太多了,限购是最简单的办法,却未必是最有效的。此前,北京、上海、广州、贵阳四座城市已经实施限购政策,其中,京沪穗的堵车状况都在不断加剧,没有因为限购得到实质性好转。前不久上海也开始遭遇雾霾攻城。从某种意义上讲,汽车“限购令”的失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一方面,限购只是缓兵之计,让新的交通压力来得晚一些。在存量汽车已经带来道路拥堵、尾气污染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哪怕再少的增量汽车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只要道路资源和出行需求的矛盾得不到有效缓解,汽车总量的持续增加,早晚都会积重难返。同时,私家车并非拥堵的主要因素。正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指出,私车对于交通的冲击是“潮汐式”的,每天也就早晚高峰的一两个小时,而大量公车却是全天连轴转。

“限购令”更多限制的是私家车,政府部门则可以利用公权力逃避限制,如是舍本逐末自然效果不佳。

近年来,“限购令”本身的合理性也备受质疑。汽车交易属于市场行为,安车当步是公民的权利,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限制和剥夺公众的消费权利,是简单粗暴的懒政思维,也很容易损害市民的切身利益。而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层面来讲,限购令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中汽协算了一笔账,如果天津等八座城市实施限购,当地汽车销量将减少约40万辆,下降25%左右,约占全国汽车年销量的2%,势必对全行业产值,乃至国民经济产生明显影响。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后发优势”,通过观察先发者的行动及效果而采取相应行动,减少自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汽车限购令在北京等地实施多年,利弊得失已经充分暴露,可谓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其他城市不应盲目跟进效仿,而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深入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审慎做出决策。

香港、东京、巴黎等城市的公交出行率均在70%以上,有的超过了80%。与之相比,我国内地城市的公交出行率普遍只有三四成。在公共交通无法提供便捷、优质服务的情况下,出台限购令未免有失草率,也不公平合理。当下,地方政府应该把更多精力用于完善城市公交基础设施,提高公共交通运力,将公交优先落到实处。如果出门坐公交,地铁成为一种享受,不劳政府出台“限购令”,广大市民也会少一分开车代步的冲动,多一分绿色出行的意识。

## 牛奶价高怪“检测”并非完全是矫情

堂吉伟德 职员

今年4月以来,国内乳企连续3次提价,奶价迅速飙升。原料奶价格虽然偏高,但还占不到成品牛奶价格的一半,加工流通环节的成本还要更高。过多、过频的检测是中间环节成本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部分企业表示,检测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已经由过去的1%左右提升至近10%。2012年我国乳企的检测费已是乳业发达国家的10倍左右。(12月17日《楚天都市报》)

一边是难以服众的低下质量,一边是不断上涨的价格,这样的反差便是国内牛奶的真实状况。面对奶价的迅速飙升,相关奶企将责任归咎于“检测过多”,其传递的意旨则值得玩味。如此论调似曾相识,2012年,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则表示:“现在国家对乳制品的抽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年上半年已经抽查了2600多次,这么多抽查会抽死人啊!”由此观之,检测成本过高导致牛奶价高,并非一句推脱责任的妄言。

按理说,对于问题重重,整个行业都

处于低端的国内乳企来说,唯有严格把关才能避免出现质量问题。而检测作为技术把关的一道程序,不仅要求企业自身要做到“批批检”,还要接受行政监管部门的临时性抽检和执法检测,层层把控之下,牛奶的质量才会获得保障和提升。问题在于,成本远超过发达国家的10倍左右的检测,质量却未能达到相匹配的水平,安全事件依然不时出现,检测的效率本身就显得可疑。

如果检测有效,可能一次就能发挥把关作用,如果检测无效,可能十次重复检测也会出现各种问题。“抽死人”的检测里面,除了表明对质量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检测手段的过度依赖之外,其间还透露出多重信息。一方面表明,检测频次太高,增加了过多的检测项目,导致重复检测的资源浪费,并因此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另一方面表明,检测收取的费用太高,甚至不排除“检测为利”的因素,并因之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是不是检测项目越多,产品质量越高呢?当然不是。检测作为一种质量约束手段和把关程序早已存在,然而众多的质量

安全隐患,并不是通过检测发现的。诸如“三聚氰胺”这等重大公共事件,最后也是在大面积的危害之后才浮出水面。有世界上成本最高、频次最多的检测,却未有“世上最优”的质量保障,说明检测的效用出现了问题,其检测的流程、程序、控制等等实质性问题,就值得重视审视。

虽然牛奶的质量安全是第一位的,但也不能无视其成本因素。若是在等质等量的情况下,却让消费者为低效的检测承担高额的成本,是除质量之外的另一种伤害。质量把控虽然目的正当,也确有必要,但也得考虑成本因素,进行成本上的评估,若是成本过高甚至不计成本,其实也有违质量把控的初衷,这与成本控制的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如何降低检测成本,实现高效的监管,也同样属于乳业提质的应有之义。否则,在质量上有所提升的国内乳业,在成本上若是没有比较优势,对其生存与发展同样是一种阻碍。

牛奶价高怪“检测”并非完全是矫情,其间表达着某些真实的诉求,如何看待与处理,需要大众的理解,更需要监管层面的面对与应对。

## 戏画闲言

### 挂起羊头卖鸭肉

吴之如·文并画

《华西都市报》报道,记者暗访得知,成都批发市场上有15元一斤的“羊肉”实际上是用鸡肉、鸭肉或者去皮的猪肉边角碎料,经冷冻、混合压制而成。卖家称:“买回去切成很薄很薄的肉片,烫在火锅里很难发现”。

“挂羊头卖狗肉”,历来是某些奸商糊弄盘剥顾客的做法。类似的不法经营行为,今天仍然并不鲜见。比如上述报道中,无良商家就挖空心思地玩弄着制假售假的把戏,且并不停留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水准,而是进一步发展成为“挂羊头卖鸭

肉”的伎俩了。

制售伪劣食品的本事越高超,表明肇事者的道德越低下。以卑鄙的手段大赚不义之财,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损害众多消费者的权益,当然为国法公德所不容,也是千夫所指的丑陋世态。有道是:

挂起羊头卖鸭肉,宰客竟敢狂掏兜;奸商损人缺德事,依法惩治无保留。

只有公众与舆论共同监督,相关执法部门及时出手,才能刹住形形色色搅乱市场秩序的歪风,让消费者放心,让人民群众舒心。

## “免费加班常态化”也缘于“加班型”薪酬体系

武洁 医生

昨天,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承办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3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中称,中国劳动力加班较多,普遍存在在工作时间较长现象。(新华网12月16日)

“加班”这事儿,的确大可不必要妖魔化。无论是企业的运营,或是任何其他组织机构的运作,其实都免不了会有一些突发事件需要应急处理。这个时候,假如一点班都不能加,的确可能意味着耽误大事儿,并继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与组织机构的运作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加班”作为特殊阶段的特殊安排,原本无可厚非。

具体到国内普遍存在的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力加班较多的现象,其实未尝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下经济活跃,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事实上,订单多,业务多,8小时按部就班无法按时交货完工,加班其实在所难免,对于员工而言,尽管加班增加了劳动强度,但是企业的产品供不应求,需要加班加点,总比企业惨淡经营,员工不得不无薪休假来得好。从这

个角度来看,加班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加班既然属正常劳动合同之外的安排,企业理所应当按照劳动法支付法定加班工资。

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固然是对员工法定工作时间的实断,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员工当然应该遵守企业的作息规定,完成企业的生产任务。不过,加班既然是法定工作时间之外的安排,既然这些时间本该属于员工,那么,究竟是选择“加班”还是“不加班”,当然应该是员工的权利,更应由员工做主才是。企业无权强制,而从劳动者自身的利益诉求出发,也理应为自身的额外付出争取应得的利益。那么,何以国内劳动者不仅加班成常态,近半数雇员甚至无任何补偿呢?

事实上,“免费”加班显然是任何雇员都不会心甘情愿的事儿,但之所以愿意免费干,背后其实有着诸多的因素。而关键点恐怕与当下国内的薪资结构密切相关。如今国内不少行业,基本月工资往往低于正常收入,而更大比例的收入,则来自奖金以及年终奖,这样一来,是否足够足额获得奖金与年终奖,主动权完全在企业手中,是否加班,加班数量的多少,自然而然的与奖金、年终奖挂钩。与其说是国内雇员困不住,热爱无报酬加班,毋宁

说是正常工时所得基本薪资根本无法让劳动者获得体面的收入,不得不超时加班,以寄望于奖金、年终奖的补偿罢了。而这样的薪酬策略,甚至在国内的一些知名IT企业中也普遍采用,并美其名曰激励机制,随之而来的,则是加班的固定化与日常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急式的加班,之所以变成了常态,甚至成了工作纪律,某种程度上正与劳动力的价值未能得到兑现与支付有关,既然无需支付加班费用,不加白不加,雇佣者从其自身利益考量,这样的好事,岂有不笑纳之理。而现实中,把基本薪资定得很低,从而使劳动者要想拿到满意的薪水只能选择超时加班,几乎成了普遍的用工定薪策略,而这一策略的背后其实不过是用工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某种程度上,国内雇员之所以很少对“超时加班”说不,劳动者的休息权之所以会被虚置,上述用工定薪策略,恐怕也正是根源所在。

基于此,“免费”加班成常态,其实更需反思当下薪酬机制中的潜规则,唯有劳动者的加班时间真正体现其市场价值,成为企业名副其实的成本,劳动力资源才不会因价值扭曲而遭滥用,国内雇员“加班”,也才不会成家常便饭。

